

【历史学】

夷陵之战后统一形势的扭转

——蜀汉与孙吴各自战略规划の破灭

闫 鹏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鲁肃为孙权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规划,之后,甘宁、周瑜、吕蒙都谈到类似的规划,这一规划中,孙吴的军事部署应横贯长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到的战略规划是“跨有荆、益”、两路出击,是以襄阳为中心的。蜀汉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刘备战败,收复荆州失地之战以失败告终,蜀、吴对峙中心由荆州西移至永安,蜀汉镇守江北的将领黄权降魏。此前,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蜀将孟达、申耽、申仪降魏,曹魏设新城郡治房陵、上庸、魏兴三郡。孙吴“竟长江所极”的战略规划与蜀汉“跨有荆、益”的战略规划至此破灭,双方丧失了统一北方的可能性,结束三国鼎立,统一全国的任务只能由北方曹魏、西晋司马氏来完成。

【关键词】 夷陵之战;蜀;吴;魏;战略规划;统一

【文章编号】 1672-2035(2014)03-0016-06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一、孙吴与蜀汉统一北方的战略规划

(一) 孙吴的战略规划

1. 鲁肃提出的“竟长江所极”。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孙策薨,孙权统领东吴国事。鲁肃与孙权一席“和榻对饮”使孙权眼前一亮,天下局势顿时清晰起来。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1]1268}

这样,鲁肃为孙权规划的“图天下”之战略规划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剿除黄祖”;第二步,“进伐刘表”;第三步,“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第四步,横贯长江而北定中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鲁肃所说的“竟长江所极”之“极”究竟在什么位置?现在我们知道,长江的源头在青海省南部的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冬冰峰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即便当时

的人不熟知长江源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人肯定知道长江流经益州。秦人已经利用长江支流岷江使成都成为天府之国,那么“竟长江所极”当然就包括益州了。

2. 甘宁提出的“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1]1293}

两年之后,建安七年(202),曹操即威胁孙权。

江表传曰: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1]1260}

建安十一年(206),江夏太守黄祖乘机袭击东吴的柴桑县。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军进入荆州,刘琮“举众降”。这样,曹操在所率北方军队的基础上又得荆州之水军、船步兵数十万。^{[1]1261}在曹操还没有对孙吴发起攻击之时,孙吴内部已经开始动摇了。孙权与臣下商议,议者都说: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

【收稿日期】 2014-01-20

【作者简介】 闫 鹏(1988-),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

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1〕¹²⁶¹

这一情况表明,孙吴对于曹操是非常惧怕的,一旦曹操率军东进,孙吴将顷刻瓦解。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甘宁向孙权献计:

今汉祚日微,曹操弥僇,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穀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勢弥广,即可渐规巴蜀。〔1〕¹²⁹²⁻¹²⁹³

甘宁的规划比鲁肃的“竟长江所极”更具体,提出“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勢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3. 周瑜提出的“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1〕¹²⁶⁴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退回北方,只留曹仁等守江陵。刘备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吴只得荆州一部分。益州还在刘璋控制之下,此时的孙权,其只实现了战略规划的第二步中的一部分。

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1〕¹²⁶⁴

周瑜的规划比鲁肃、甘宁二人更加详尽,更加具体化。他明确提出,乘曹操忙于北方事务之机,一举占据益州,吞并张鲁,并让奋威将军(奋威将军指孙权的堂兄孙瑜)留守汉中,与马超结援,以其为汉中的一线,自己则与孙权从襄阳北上,这样,便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图天下的完整战略规划。

只可惜,“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1〕¹²⁶⁴。横贯长江的军事部署只能暂时搁置了。

4. 吕蒙提出的“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

鲁肃死后,吕蒙屯陆口。

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隳、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

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1〕¹²⁷⁷⁻¹²⁷⁸

吕蒙认为应当“循江上下”,他自己则据襄阳,这与鲁肃、周瑜、甘宁的规划不谋而合。

上面四点分析,鲁肃、甘宁、周瑜、吕蒙为孙权的战略规划基本上都是全据长江,军事部署都是横贯长江,并且,规划逐步详尽,情势逐步明了。

(二) 蜀汉的战略规划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赤壁之战前夕,刘备在徐庶的推荐下,三顾草庐见到之后有如鱼水之情的诸葛亮。在此之前,刘备先是投靠公孙瓒,后徐州牧陶谦为曹操所攻,备率兵相救,陶谦死,刘备据其遗命,代为徐州牧。与盘踞寿春的袁术相拒,为另一军阀吕布所乘,败归曹操,很为曹操看重,又因谋杀曹操事泄,逃到徐州,统众数万人。建安五年(200),被曹操击破,往依袁绍。官渡之战后南奔投靠刘表,屯兵于新野。

在隆中草庐中,刘备问计于诸葛亮。

亮答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⁹¹²⁻⁹¹³

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大致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第二步是在占据荆州的基础上连跨荆、益二州,并特别强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第三步是等待时机两路出击,明确提出从荆州出宛、洛,从益州出秦川的两路出击战略。

在第一步中,他特别强调荆州的重要性,荆州乃“用武之国”,言外之意,在将来的北伐路线中,必定有荆州一路。第二步中,他特别强调“若跨有荆、益”,跨就是连的意思了,荆、益二州必须是同时占据,如只占据其中一州,则达不到第三步两路出击的战略规划。诸葛亮之所以能将连跨荆、益的战略规划描述得如此详尽细致,并且之后的实践也充分证明这种战略规划的可行性,这与他出山之前所居住

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荆州北据汉、沔”需要指出的是,汉、沔之沔水自西向东依次流经益州的汉中郡(治所在南郑),进入荆州,汉水流经魏兴郡(治所在西城)、襄阳郡(治所在襄阳),于夏口汇入江水,夏口再往东南就是江夏郡。同时,汉水的支流堵水流经上庸郡(治所在上庸),汉水的支流筑水又流经新城郡(治所在房陵)。^{[1]991-992}此时的诸葛亮就隐居在南阳的邓县,而邓县又位于襄阳城西二十里(《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1]911})。据此可知,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就位于汉、沔一线上,他对汉、沔沟通荆、益二州之概况应当说要比刘备、鲁肃、甘宁、周瑜、吕蒙等人更要清楚。他在规划中的第三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此处的宛(宛县)就在淯水边上,淯水由北向南流经荆州注入比水,比水在襄阳郡汇入汉水。

据上面分析,可以得出诸葛亮战略规划是以荆州之襄阳郡为中心的,向西可以溯汉、沔入汉中,从而援助从益州出秦川一线;向北可以据荆州伐宛、洛。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攻樊城,樊城就在襄阳郡的西边,离得很近。这样的战略规划,基石就在于连跨荆、益。连跨荆、益实现不了,这一规划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二、蜀汉与孙吴战略规划的可行性

(一) 蜀汉战略规划的可行性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同年,关羽率军攻打樊城。

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郃、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1]941}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恟惧。或谓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汝南太守满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郄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持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2]2205}

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2]2207}

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郡下皆曰:“王不

行,今败矣”。^{[2]2211}

这里满宠所说的郄县,《晋地理志》:“襄城郡复有郄县,盖东汉省而魏、晋复置县也。”^{[2]2205}再具体一点,郄县在襄城西北,汝水流经二城,郄县在西,襄城在东,又襄城往东北走不远就是颍川郡之许昌了,当时曹操及汉献帝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关羽由樊城攻至襄城,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已降关羽,曹操已经准备迁都了。由此可见,荆州这一线的攻击对曹魏的威胁相当大。

益州一线,刘备由汉中出天水、陇西,乘渭水顺流而东下,进击弘农、洛阳,进而与关羽形成两线夹犄角包围魏都之势,诸葛亮特别指出的“北据汉、沔”则成为汉中与荆州两路进兵路线的相互援助的重要通道。应当说,西路是顺流而下,比荆州一线更具地理优势。

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1]950}

所以在诸葛亮的两路出击战略规划中,西路是主线,东路重点不在攻,而在以攻为守,曹魏必须派重兵扼守南阳、汝南等郡,此其一。其二,秦川一线,沿渭水而下,易攻难守,加之兵力不济,曹魏将十分被动。其三,如若刘备能联合孙吴在合肥、徐州一线以攻为守,那么曹魏将不得不从荆州一线调兵以防守合肥、徐州。而同时,曹魏又不得不调回兵力以解洛阳、颍川之围都之患,这样做的后果便是荆州、徐州两线由以攻为守转为大举北上,曹魏其势已溃,剩下的只是孙、刘两家逐鹿中原了。

再推进一步,蜀国是两路出击,吴国只有一路,并且蜀国已先吴国一步由水路攻取洛阳。孙、刘两家逐鹿中原的天平已倒向蜀汉。

(二) 孙吴战略规划的可行性

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前,孙权西击黄祖。

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楫间大纆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纆,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1]1291}

这段史料说明沔口易守难攻。沔水西扼汉中及东三郡,此地更是崇山峻岭,易守难攻。^{[3]246}孙吴占据荆州,便可充分利用汉、沔之便利。《三国志》卷四

十《刘封传》:“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军会上庸。”^{[1]991} 汉中可以乘沔水下,孙吴亦可由沔水上汉中,“竟长江所极”,从而绕天水、陇西顺渭水而下(东三郡之地理形势决定曹操不能据此出兵。《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记五十九:“三月,魏公操自将击张鲁,将自武都入氏”,也是东三郡不能出兵一佐证)。如周瑜所述“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1]1264} 如吕蒙所述“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1]1278}

吴与蜀的战略规划如此地形似,也正因此,双方不能相容。建安二十四年(219),乘关羽攻襄樊之机,孙吴白衣渡江,直取其后,占领荆州只是表面现象,斩蜀汉两路为一路才是其真正目的。孙吴不是不愿蜀吞魏,而是认识到蜀汉吞魏,便意味着吴国的末路也近在咫尺。因此,孙吴偷袭关羽后方是为了孙氏的战略规划能够实现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而且只能胜,不能败,关羽只能死,不能生。

三、不得不打的夷陵之战

(一) 汉中的争夺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攻汉中。

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1]881}

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五年(210),建安十六年,曹操便急匆匆攻汉中,他充分认识到汉中的重要性。夺取汉中,东可以沿汉、沔击荆州包抄关羽,南可以一路坦途直取益州,往西则可以巩固对凉州的统治。

(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遣黄权将兵迎张鲁,张鲁已降曹公。^{[1]883}

(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

等攻申耽于上庸。^{[1]884}

刘备一听说曹公定汉中,赶紧与孙权讲和,并以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用这样的代价去换得东线的稳定,以保汉中,可以推知汉中之于益州乃至刘备整个战略规划的重要性。下面史料则可作为汉中重要性之一佐证:

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1]1013}

(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1]961}

而刘备之所以能接受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自己只占据南郡、零陵、武陵,一方面是急于救汉中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他据南郡、零陵、武陵仍然控制着汉、沔的绝大部分,其战略规划还存在,这是他所能容忍孙吴的底线。当襄樊之战孙吴控制整个荆州之后,刘备失去了对汉、沔的掌控,这样的形势就为他所不能容忍了,这才有了221年的夷陵之战。

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1]991}

这样,申耽领上庸(治上庸郡),申仪领西城(治魏兴郡),西城就在汉水边上,上庸在汉水支流堵水边上,刘备已经在为沟通两路尽快北伐做准备。

(二) 夷陵之战——蜀汉与孙吴为实现各自战略规划的最后博弈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笈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1]1120-1121}

襄樊一战,刘备荆州之地尽失,其两线出击的战

略规划之东路战线不复存在。为了重新实现其战略规划,刘备于黄初二年(221)发动了对吴国的战争。据此,认为夷陵之战是刘备为了消灭吴国的说法有待商议。夷陵之战是刘备为了收复荆州,重新实现其两路出击伐魏的战略规划,下面作几点分析:

1. 夷陵之战,刘备并没有采取水路、陆路并重的军事部署,而是以陆路为主。

(黄)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1] 1043-1044}

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1] 890}

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1] 1346}

猇亭在江右,夷道在江左,从猇亭沿长江往东不远就是江陵。而夷陵是荆州的重要关限,陆逊也认为,夷陵一旦被攻破,荆州将不保(朱大渭《<隆中对>与夷陵之战》^[4]引注《陈龙川文集》卷五“使备能遣黄权率水军以为先驱,顺流而下,掩其未备,而备率步兵分进,疾趋夷陵”,“得夷陵则荆州可有”)。刘备完全可以采取黄权的建议,水路、陆路两路大军齐下,一鼓作气攻下荆州,但他却不听从黄权的建议,把黄权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自己率主力在江南,大军在夷道、猇亭驻兵不前,换句话说,刘备放弃了水路进军吴的策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样,刘备只以陆路做准备,却将水军顺流而下的作战优势弃之不用,虽然“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但也毕竟是天下所共知的枭雄,^[4]还能连这点认识也没有?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中刘晔对刘备伐吴的一段评说:

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1] 446}

2. 刘备伐吴的真正目的:震慑东吴,迫使东吴送还荆州失地。

(建安)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今策渊、郤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

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1] 961}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孟)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都郡,以达领新城太守。

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怀集将军,徙居南阳,仪魏兴太守。^{[1] 994}

“贼今已在江陵,吾(刘备)将复东,将军(陆逊)谓其能然不?”^{[1] 1348}

220年,本属蜀汉的上庸(申耽治)、魏兴(申仪治)均因申耽、申仪叛变而归曹魏所有,曹魏在东三郡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郡——新城郡,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孟达为新城太守。

221年,刘备大举伐吴。刘备面对东三郡的巨大变故与关羽失荆州,并没有依法正所规划的以益州北部为战略中心(朱大渭《<隆中对>与夷陵之战》^[4]认为:其着眼点是“蚕食雍、凉”,吞并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庞统等人的意见借鉴了历史经验,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却于一年后大举伐吴,以他与法正、诸葛亮的关系而言,他不可能既不接受法正的战略规划,同时又与诸葛亮的战略规划背道而驰。朱大渭先生也认为“谈到联吴政策,也不能说刘备没有认识”。^[4]因此,笔者认为,刘备伐吴是为了重新实现以襄阳为中心的战略规划,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收回关羽丢掉的荆州之地,实现诸葛亮指出的以襄阳为中心的两路出击的战略规划。

(三) 夷陵之战后蜀汉与孙吴各自战略规划的破灭

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1] 890}

及吴将军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1] 1044}

夷陵大战以后,刘备由夷陵退回永安,与东吴言和,此后,蜀汉与东吴以巫县为界,以东属吴,以西归蜀。刘备收复荆州失地的尝试至此失败。

而孙吴虽然占据荆州,但此时,位于荆州西北方位的魏兴、上庸、房陵已因申仪、申耽、孟达的叛变而归魏所有,魏将原来的三郡合为新城一郡,由孟达任太守。同时,黄权降魏,又使得曹魏巩固了对新城郡

的控制。孙吴要想在这样的情势下实现其“竟长江所极”的战略规划,其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下面一条史料可作为这一事实的佐证: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1]1348}

四、结论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后不久,鲁肃对孙权谈到“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1]1268}按照鲁肃的规划,第一步是剿除黄祖;第二步是占据荆州;第三步是剑指益州。以此,平定长江以南,使孙吴的军事部署横贯长江。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占据荆州之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这个时候,孙吴仅仅实现了战略规划第二步,但只占据荆州的一部分,并没有全据荆州,更谈不上第三步占据益州了。

建安十二年(207),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规划的是:先“跨有荆、益”,然后一路从荆州出宛、洛,另一路从汉中出秦川。这一规划是以襄阳为中心的。这里,诸葛亮首先提到的便是“跨有荆、益”,如若没能“跨有荆、益”,则之后的一系列

战略规划都没有施行的可能性。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占据荆州四郡,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领益州牧,“跨有荆、益”初步实现。

建安二十五年(220)初,关羽被杀,蜀汉在荆州之地全部丢失。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蜀将孟达、申耽、申仪降魏,曹魏设新城郡治房陵、上庸、魏兴三郡。刘备面对东三郡的巨大变故与关羽失荆州,并没有依法正所规划的以益州北部为战略中心,却于一年后大举伐吴,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东吴为关羽复仇,而是为了收回荆州之地,实现诸葛亮指出的以襄阳为中心的两路出击的战略规划。

蜀汉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刘备战败以后,蜀、吴对峙中心由荆州西移至永安,蜀汉镇守江北的将领黄权降魏,这样,蜀汉收复荆州的尝试至此以失败告终,孙吴“竟长江所极”的战略规划被曹魏与蜀汉共同截断,横贯长江的战略规划至此破灭。夷陵一战,蜀汉、孙吴失去了统一北方的可能性。结束三国鼎立,统一全国的任务只能由北方曹魏、西晋司马氏来完成。●

【参考文献】

- [1] (西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 朱大渭.《隆中对》与夷陵之战[J].江汉学报,1962(9).

【责任编辑 张 琴】

On the Turn of Unification Situation after Historic Yiling Battle

—— The Fall of Respective Strategic Plans of Shu-Han Kingdom and Sun-Wu Kingdom

YAN Peng

(Colla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fth year of Jian'an Period, Emperor Xian of Han Dynasty (A. D. 200), Lu Su proposed to his king, Sun Quan, the strategic plan of “possessing the Yangtze River area by its natural chasm”. Afterwards, generals Gan Ning, Zhou Yu, and Lu Meng referred to their plans similar to this one. In this plan,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of Sun-Wu Kingdom should b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bank. On another side, in the “Longzhong Strategy” offered to King Liu Bei by Zhuge Liang, the strategic plan was that, taking Xiangyang as the center, they could attack the enemy from two directions through Jing and Yi. In the second year of Zhangwu Period, Shu-Han Kingdom, King Liu Bei suffered a defeat in Yiling battle, thus the endeavor of recapturing Jingzhou ended in failure. After General Huang Quan surrendered to Wei Kingdom, the confrontation center between Shu and Wu kingdoms then moved from Jingzhou to Yong'an. Previously, in the first year of Huangchu Period, Emperor Wen of Han Dynasty (A. D. 220), generals Meng Da, Shen Dan, and Shen Yi of Shu-Han Kingdom surrendered to Wei Kingdom. Cao-Wei Kingdom then established a new city to manage Fangling, Shangyong and Weixing counties, which marked the fall of their strategic plans by Shu-Han and Sun-Wu. They both lost the possibility of unifying north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of confrontation by three kingdoms thus ended. At the time, the unification endeavor of the whole country could only be made by Cao-Wei Kingdom ruled by Sima Family from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Key words: Yiling Battle; Shu Kingdom; Wu Kingdom; Wei Kingdom; strategic plans; unification